

理想是怎樣失去的？

● 陳 彥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由高華撰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引起關注的重要成果。此書的標題就點出該書主旨在於回答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

如何在中國首先是中國共產黨內獲得認可和確立的這樣一個關乎中國歷史命運的全局性問題。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

如果說，在讀高華此書之前，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過延安整風作為運動模式對中共的重要影響的話，那麼讀罷高華此書，讀者可以得出結論：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不僅重要，它實則是中共歷史的決定性的轉折點。沒有延安整風就不會有毛主席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會有中共的建國。延安整風不僅將中共鍛造成為一個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也為中共建國提供了一整套統治方式和動員程序。從中共建國以後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運動來看，沒有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會有中共的執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了解延安整風，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運動；不對延安整風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實研究，就無法理解中共政治運動的機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主旨在於回答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如何首先在中國共產黨內獲得認可和確立的這樣一個關乎中國歷史命運的大問題。讀罷高華此書，讀者可以得出結論：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不僅重要，它實則是中共歷史的決定性的轉折點。

此書通過對整風運動的溯源，揭示了以中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規模群眾運動作為奪取政權、保持政權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國際根源和中國本土文化根源。作者還善於通過特定的事例，以簡練的筆法勾畫出歷史人物的鮮明個性，一代共產黨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制和規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運動，也就無法理解中共的歷史、中共的性質。

高華此書分上下兩編共十五章：上編探尋整風運動的起源，下編研究整風運動的進程。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但其根源卻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創立根據地的蘇維埃運動。前五章是疏理整風運動的「史前史」，將研究的觸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創始時期。通過對整風運動的「尋根」，讀者可以發現，在中共運作的初期就已經隱含着對自己同志殘酷鬥爭的傳統。這一傳統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險惡環境相聯繫，但根源仍然是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高華以十章的篇幅論述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整風運動開始於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歷時三年之多，經歷了整風、審幹、肅反三個互相銜接又層層推進的階段。延安整風是中共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長期以來由於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黨史不僅千篇一律頌揚整風運動的偉大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而且對整風中的一些重大史實也隱而不報，如將整風後期殘酷打擊革命同志的長達半年之久的「搶救」運動，說成是整風的插曲並將責任推到康生身上。80年代以來，一部分文獻資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隨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數量可觀、較為真實的個人回憶錄得以問世，才使得延安整風的真相有可能重現於世。高華新著是迄今為止資料最為詳盡的關於延安整風的著述，作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辨各

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他的每一重要論據都有來源引證。用高華本書前言中的話說，此書旨在「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為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僅僅將延安整風的歷史清疏整理，已經是一項巨大的學術成就，但高華此著的意義又遠在一部實證史學著作之上。因為此書企圖尋找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轉換，個人行為與時代大勢之間的交叉互動，思想體系、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權勢更迭之間的有機聯繫。通過對整風運動的溯源，對毛澤東審時度勢，在理論、韜略、權謀之間縱橫捭闔的高度理性策劃的內在機理的疏理，對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層的微妙關係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中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規模群眾運動作為奪取政權、保持政權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國際根源和中國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發人深思的獨到觀點。

此書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史學專著，但卻具相當的可讀性。僅以人物為例，作者善於通過特定的事例，以簡練的筆法勾畫出歷史人物的鮮明個性。項英的剛直不阿，周恩來的忍讓練達，任弼時的圓通持重，王明的書生幼稚，張聞天的正直謙讓，康生的奸滑陰毒，彭德懷的耿直豁達等等，一代共產黨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毛澤東自然是此書的中心，高華筆下的毛澤東老

辣跋扈、縱橫捭闔、收放自如，具有鮮明的個性。他相信權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與毛相比，王明雖然是斯大林的學生，他學而且信；毛澤東也學斯大林，但學而不信。信的最終鬥不過不信的，這是毛澤東留給中國的遺產。

以下是筆者讀完高華此書後的幾點較深的感想。

一 毛澤東思想是戰爭與落後的產物

延安整風是中共決定性的歷史轉折。這一轉折意味着中共的「脫布化」，中共的民族化。這一轉變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是共產主義中國形態的確立，是舶來主義與中國土壤的有機結合，中國式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從組織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化，中共脫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的指揮，獲得相對獨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毛澤東的一系列思想、語彙、戰略、策略等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方針，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和導師。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國時勢造成的。毛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最終佔了上風，除了他本人的天賦、謀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歸功於中國的戰亂和落後。沒有長期的戰亂，毛就不可能利用其軍事才能壓倒眾多的知識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領袖；沒有落後的農民國的現

實，毛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將其融合中國傳統和斯大林極權主義的專制主義強加於40年代初仍然充滿理想色彩的中國共產黨。

高華此書對這一點有充分的展現。如，延安高幹供應制的建立，對中共黨內知識份子出身的人的打擊以及對農民出身的軍人幹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覺地利用農民的情感控制軍隊而將中共的軍隊改造成一支具有農民起義色彩的紅軍。正如王實味指出，「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級差序制度。實際就是將「論功行賞」的農民造反原則制度化。同這種根深柢固的農民意識相一致，毛澤東對知識、知識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識、留蘇派知識份子）、黨內「教條主義」份子切齒痛恨。他曾指斥留蘇派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批評他們「言必稱希臘」，指斥知識「教條」「比屎還沒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讀馬列的書，即使是如此，他讀得最通的書，也就是最合其意的書，是那本由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布）黨史》。原因無他，此書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黨內鬥爭的指南。

二 對五四精神的背棄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舶來意識形態與中國專制傳統的雙重勝利的話，那麼這個勝利就不僅僅意味着「留蘇教條派」的出局，同時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敗。延安精神的確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產物。高華此書在這一點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見。作

毛澤東曾指斥留蘇派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批評他們「言必稱希臘」，指斥知識「教條」「比屎還沒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讀馬列的書，他讀得最通的是那本由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布）黨史》。原因無他，此書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黨內鬥爭的指南。

者明確將「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份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頁304）作為毛澤東思想革命四原則中的第二條。高華對王實味個案作了詳盡分析。王實味雖然接受馬列主義投奔延安，但他為純真理想所驅使，思想深處仍受五四民主、科學所激勵。他正是以平等、博愛為參照來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並且直接溯源到等級制的專制主義傳統，這正是五四精神的強烈閃光。而王實味最後被砍頭，是整風運動因言獲罪的死囚，成為毛澤東思想確立的祭品。只要王實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獨立的五四精神還在，就不可能有毛澤東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黨天下。這一認識不僅是對延安整風性質所作出的準確結論，而且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反思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新起點。

三 知識份子的「原罪」

以意識形態作為鞏固和強化個人權力的手段並非毛澤東的發明，但將意識形態教化推廣至全黨每一個幹部黨員，以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的方式，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而達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應該說是毛澤東對斯大林「大清洗」的創造性發展。

延安整風雖然是以中共全黨為對象的，但由於意識形態是其主要武器，因而黨內知識份子首當其衝。同時由於毛澤東發動整風的首

要政治目標是徹底摧毀王明、張聞天等留蘇派的所謂教條主義的影響，因而知識尤其是書本知識便順理成章地成為批判對象。從這裏開始，毛澤東找到了一個屢試不爽的發動意識形態教化運動的操縱桿。這個操縱桿可以概括為某種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類比的「知識原罪」概念。可以說，延安整風之後，任何知識，尤其是同人文、社會相關的知識，只要未經過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過濾，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這種知識的知識份子就應該接受改造，就需要贖罪。同基督教一樣，贖罪需要經過一定的儀式，而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式的「靈魂革命」就是贖買「知識原罪」的中國儀式。從今以後，不經過這一儀式，就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共產黨人。

高華在本書中對知識份子改造運動個案和細節作出生動的描述，充分揭示出這種類宗教「煉獄」儀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據。高華指出「隨着『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普遍產生了負罪意識（原罪意識——本文作者按），知識份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過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和人民毫無價值，……簡直是罪孽深重！」（頁424）從此，「知識原罪」便成為套在中國知識份子頭上的緊箍咒。

高華強調延安整風中的中國內聖之學的痕迹，但筆者則更傾向於毛澤東的延安整風的模式借鑒主要來源於蘇聯。中國儒學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種「慎獨」功夫，同基督教的個體懺悔有相通之處，但卻不是將個人隱私（家醜）張揚於大庭廣

以意識形態作為鞏固和強化個人權力的手段並非毛澤東的發明，但將意識形態教化推廣至全黨每一個幹部黨員，以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的方式，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而達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應該說是毛澤東對斯大林「大清洗」的創造性發展。

眾。將這種「滌蕩靈魂」的公共懺悔儀式推廣至全黨範圍，表明毛澤東深得斯大林真傳。高華以翔實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風運動的結果：一方面是毛澤東個人獨裁和毛澤東思想獨尊在全黨範圍的確立，另一方面則是黨內知識份子包括黨內高級幹部在內的其他個體的個人尊嚴、獨立全部蕩滌一盡，成為革命機器中沒有自我意識的「齒輪與螺絲釘」。高華以丁玲為例來說明這一現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過讀完此書，掩卷之時，聯繫到中共建國以後的現實，讀者也許會問：當年受到殘酷鬥爭、非人打擊的受害者，為甚麼對延安整風尤其是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三緘其口？當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後的運動中又對其他人大打出手，成為殘酷的整人者？對於這些問題，結合東歐蘇聯與中國歷次運動的實踐，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時也是既得利益者，因為只要他們挺過這一關，他們仍然可以在這個機器中佔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與獨裁

高華在本書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來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很顯然，當時的延安不僅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而且也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一個以共產主義作為信仰與行動指南的極權主義的小社會。不過，這是一個初始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具有真誠信仰、富有朝氣的極權社會。王實味、丁玲、蕭軍等具有自由化

傾向的知識份子及更多的嚮往平等、自由的知識青年大量來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滿了熱情浪漫的氣息。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延安整風這樣的革命洗禮，沒有嚴格的紀律和強有力的領導權威，延安這個小社會可能僅僅是偶爾匯聚的浮雲，而難以成為中共今後奪取全中國的革命中堅。

延安整風其實包含着共產主義極權的一個根本趨向。一方面，延安整風是中共由草創走向成熟，是意識形態由思想變為制度，是馬列主義由理論教條變為實踐綱領定型階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風也是毛澤東個人專斷的確立，是理想主義讓位於政治權謀，是烏托邦走向強制的決定性轉折。中共本來沒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證集體決策的制度化機制，延安整風則使個人獨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風前的毛澤東雖然同中共中央的關係存在一定的衝突與緊張，但他卻必須利用制度規定對付他的政敵，直到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才可以甩開制度的束縛。延安整風所建立的制度是一個助長專斷的制度，自延安整風始，政治運動將成為共產黨的傳統，成為推動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這種「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運動，使得毛澤東可以甩開一切制度規定和集體決策框架而另起爐灶。高華對延安整風中中央總學委的論述很具啟發意義。由於運動的特殊要求，臨時組織就可以壓倒常設組織，凌駕於黨的法定最高決策機構之上，於是臨時制度就可以拋開正規制度，而最終使個人專斷成為制度。延安總學委的核心是毛

自延安整風始，政治運動成為共產黨推動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制度手段。正是這種「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運動，使得毛澤東可以甩開一切制度規定和集體決策框架而另起爐灶。由於運動的特殊要求，臨時組織就可以凌駕於黨的法定最高決策機構之上，可以拋開正規制度，而最終使個人專斷成為制度。

澤東與康生，而實際上由毛澤東一人支配。文革時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正是這種以臨時機構取代正式機構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則與人道原則

在共產革命中，功利主義往往是重要的行動原則。長期的戰亂，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得中華民族難於從長遠思考。盡快獲得獨立、擺脫落後，使得功利主義成為時代的要求。從功利出發，毛澤東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則、勝利的原則否決其他的原則，甚至將爭取勝利的原則變成壓倒一切的原則。高華在此書中詳盡地展現了任弼時、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在同毛澤東發生分歧時所表現出來的忍讓妥協精神。在相當多的時候，這種妥協都是以黨的利益、大局為重的名義作出的。在那種艱苦轉戰的年代，為達目的，沒有妥協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體利益、人民利益為由，要求個人服從集體，小我服從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協導致大的妥協，個體的妥協為個人獨裁打開了大門。當毛澤東個人獨裁的紅太陽升起之時，就是美麗的烏托邦革命理想終結之時。高華此書似有強調毛澤東本人在延安整風慘案中的個人責任的傾向，但這個制度本身沒有制約機制似乎是更為根本的原因。不僅延安整風之後黨內冤案錯案如影隨形最終無法避免，而且按高華在本書中的勾勒，1931年鄧發在閩西的肅反擴大化，張國燾、夏曦在鄂豫皖的肅反擴大

化都可以佐證：殘殺和打擊同黨是攫取和鞏固權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僅如此，這種馬基雅維里式的功利主義的權力崇拜還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中獲得了科學與道德的論證。

最後，在筆者看來，本書也有某些可完善之處，如對延安時期的大背景交代較少。在當時的戰爭狀況下，毛澤東之所以專橫跋扈、置同志於死地，除了他的權謀暴烈之外，應該還有當時中國革命節節成功的大背景，這一背景是毛澤東整風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一條件使得毛更可以同當年的列寧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純然的屠殺政敵。不過，建國之後的毛澤東則漸漸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強自己的權勢來掩蓋自己執政的錯誤，而不是利用革命實踐的成功來鞏固自己的權勢。

另外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本書作者對延安整風驚心動魄的描述，讀者可以從中得出的邏輯結論是：中共這架機器從整風開始就已經是以奪取政權作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僅僅是奪取政權的工具。不過，高華自己卻沒有完全走向這個方向，發人深思。筆者以為，共產主義革命作為中國近一個世紀的革命歷程，自有其深刻的歷史與社會的原因，甚至也應該對此給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這種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理性認識，堅決地、義無反顧地告別它。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職法國國際電台。

高著也有可完善之處，如對延安時期的大背景交代較少。在當時的戰爭狀況下，毛澤東之所以專橫跋扈、置同志於死地，應該還有當時中國革命節節成功的大背景，這一背景是毛澤東整風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一條件使得毛更可以同當年的列寧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純然的屠殺政敵。